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马家窑类型彩陶（2022GLSF22）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渭河一带，范围涉及今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等省区，距今约5000至4000年，以彩陶生产和使用为鲜明特色。马家窑文化源于仰韶文化，是仰韶人群对西北高地大规模开拓的成果，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文化，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持久且深远的影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很多地区尤其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和模式日益清晰，而黄河上游在相关问题上依然模糊不清，文明探源的很多重要问题尚未触及。马家窑文化正处在黄河上游的核心腹地，年代居于文明探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填补西北地区空白的重要意义。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为寺洼文化命名地。遗址西靠九龙山，面向洮河。遗存主要分布在山前平缓坡地上，河流自南向北从其前方流过，见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以及辛店文化遗存，面积约200万平方米。1924年，安特生首次发现该遗址，1945年夏鼐在此开展考古发掘。2018年至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遗址开展7次发掘，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现并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位于遗址北部，现已发现三重近方形“围壕(沟)”、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窑和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时代从马家窑类型延续到半山类型，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近方形布局大型“围壕(沟)”。

三重“围壕(沟)” 整体近正方向，平行分布，直角转弯，形制和布局相当规整。西南转角位于寺洼山村委会北侧，北接洪水沟，东至断崖。东北部缺失，现存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50米，内部复原面积近30万平方米。三沟口部均宽约9~11米，中、外圈深约3~4米，内圈深约1.3~2.5米，相互间距约8~9米。沟底部西南角最高，与东、北端落差约9~10米。多处见有通道，且大致对应，应是经过精心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大型工程。从年代、形制布局、内部堆积和出土遗物看，三者应同时存在和使用过，但功能性质有别。中圈和外圈应属“围壕”，兼具防御和排水的功能；内圈沟内发现丰富的生产生活遗迹和遗物，应属沿“围壕”规整分布的“围沟”状生产生活区。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均为马家窑类型时期，距今约5000年，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的多重近方形大型“围壕(沟)”结构，为后世(长)方形“城池”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很可能是中国(长)方形“城池”的雏形。

“围壕”内侧内涵丰富，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

“围壕”内侧，内圈“围沟”内发现了陶窑、灰坑、房址、柱洞等诸多遗迹和大量遗物。附近区域也发掘出多处呈片状分布的遗迹群，见有大量房址、窖穴、陶窑等遗迹，部分房址应属手工业作坊。结合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具、陶窑和烧制废品的发现，可以确定马家窑类型时期，内圈“围沟”及其内侧区域存在多处制陶区，且布局新颖，在马家窑文化中属首次发现。鉴于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不排除这是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马家窑文化制陶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彩陶的生产和使用均达到了史前时期的巅峰。此外，内圈“围沟”内侧还发现了同时期的石器加工场所，出土成套的石钻、石环半成品和废料。上述均凸显出手工业生产在马家窑社会中的独特地位。

马家窑类型泥质灰陶（2017GLMT200–120）

马家窑类型彩陶（2017GLMG1）

“围壕”外侧，发现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

“围壕”以外，经勘探和试掘，在西侧发现了马家窑类型的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人工堆土”局部似有夯打痕迹，与疑似“道路”均靠近“围壕”通道处。这在马家窑文化中也属首次发现，体现出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精心规划、丰富内涵和所达到的文明化程度。遗址西侧近山前，还发现了规整的夯土建筑基址，时代待确认。

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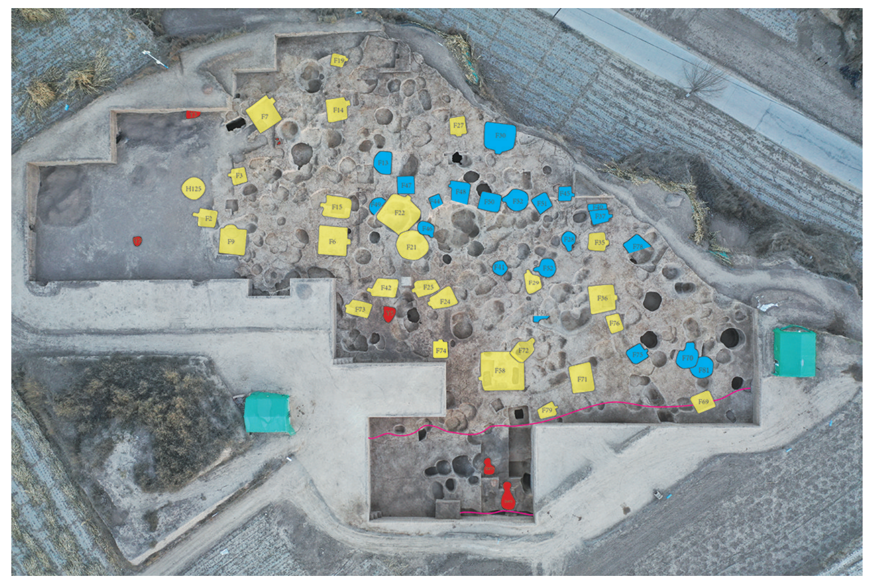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中，半山类型聚落的内容前所未见，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发现。半山类型遗存此前的考古发现主要是墓地，仅在青岗岔遗址发现过几座房址、陶窑和窖穴。本次在“围壕”内侧，发掘出一批半山类型房址、灰坑、窖穴、陶窑和墓葬，与这一时期尚存的“围壕”共同组成了半山类型聚落的重要内容，填补了半山类型聚落发现的空白。半山类型房址内葬人的现象也属首次发现。半山类型大型聚落的发现，还对探讨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尤其是一些重要生业技术如冶金，以及绵羊、黄牛、麦类作物的传入和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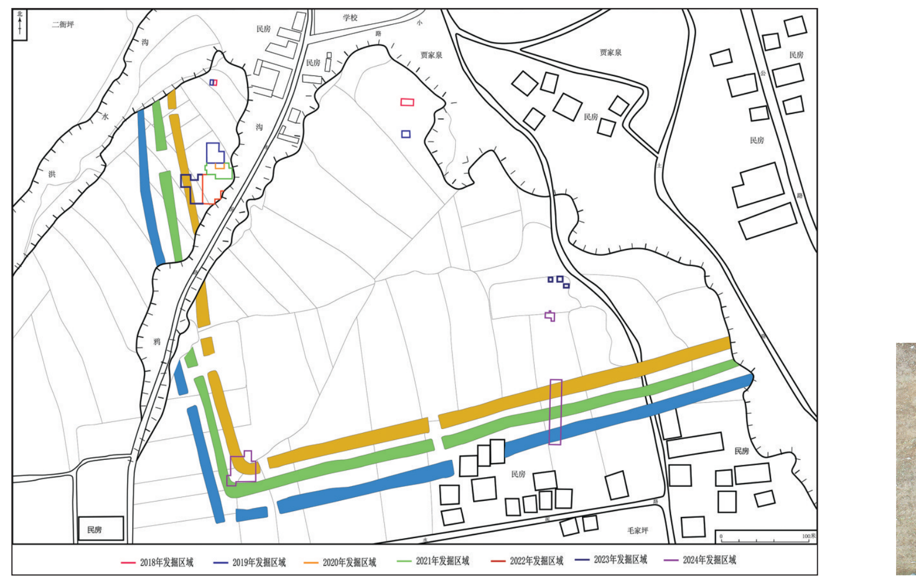
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级别最高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聚落以近方形“围壕”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围壕”内侧，发现呈“围沟”状和片状分布的多处生产生活区，发掘出丰富的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和大量遗物。“围壕”外侧，西、南部发现疑似“道路”、大面积“人工堆土”和其他丰富遗存，聚落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遗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还分布着数十处同时期不同规模的遗址，大者如朱家坪、格致坪等，形成了一处马家窑文化聚落群。寺洼遗址在其中属引领者，应是一处马家窑文化的中心性聚落。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大型聚落的整体面貌和丰富内涵，彰显了西北地区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内容及模式。马家窑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一路向西北、西南开拓，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色，重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重要文化，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其所取得的成就毫不逊色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围壕(沟)”内侧西北角发掘区房址布局图(上方东；蓝色马家窑类型，黄色半山类型)


寺洼遗址历年发掘区及“围壕(沟)”分布图

“围壕(沟)”西南角内侧拐角(上为北)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发掘背景

青藏高原的新石器化、定居化、农牧化、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等议题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2018年开始，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围绕着上述这些问题，开展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影响”的调查工作，于2019年首次发现玛不错遗址。2020年至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开展了5个年度的田野发掘工作。

玛不错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康马县嘎拉乡政府驻地东北10公里的玛不错湖岸，海拔4410~4430米，是一处围绕湖滨的旷野遗址，分布面积14万余平方米，目前发掘1650平方米。

发掘严格遵循《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以探方的全面揭露为主，探沟和暴露墓葬的重点发掘为辅。对墓葬和大型石构建筑、重要遗迹与地层进行多视角三维重建。在发掘过程中，对所有发掘出土的堆积进行3毫米筛选，采集陶片等遗物标本共计2000余袋。采集浮选、植硅体、土壤微形态、残留物、沉积物古DNA、光释光等样品1300余份。对不同类型堆积单位设计针对性的记录表和采样表。团队围绕玛不错遗址实际情况，针对性逐步探索出了科学系统的发掘、记录和取样标准。

考古发掘收获

根据地形地貌、遗存分布特点，可将遗址划分为三个区域，主要分布于玛不错湖的南岸、东南岸和西北岸。Ⅰ区位于湖滨东南岸的山坡、山脊和山脊东、西坡脚，Ⅱ区位于湖泊南岸的垭口坡地，Ⅲ区位于湖滨西北部的洪积坡地。

以一处垭口为界，Ⅰ区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是主要发掘区。Ⅰ区南、北部地层堆积有较大区别，北部舌形阶地南端地层的文化层堆积较厚且年代集中，厚度可达1.5米，包含大量的木炭、动物骨骼、陶片、石器和骨角器；南部山坡、山脊和阶地地层堆积较薄，墓葬多开口于第一层之下，山脊东侧坡脚地层堆积较厚且有文化鲜明的三期叠层。

综合现有堆积关系、非碳库影响测年结果、墓葬形制和各类文化遗物的特征，可将遗址划分为四期。

第一期距今5000~4000年，以发达的戳印纹—划纹为装饰的磨光侈口平底罐、折腹平底盆为代表，流行各类骨蚌器和水晶为原料的细石器。其中距今5000~4500年的遗存分布于Ⅲ区，遗迹类型为局部活动面；距今4500~4000年的遗存出现于Ⅰ区，遗迹类型以厚文化层和俯身直肢石棺墓为主，特殊葬俗有墓内焚烧的仰身葬；其中墓葬主要集中于Ⅰ区北部，南部山脊也有少量的分布。

第二期距今4000~3300年，以放射线划纹夹云母褐陶单耳平底罐为代表，流行条形并耳，骨器和细石器衰落，新出现青铜器、玛瑙、红玉髓和费昂斯等遗物。主要遗存分布于Ⅰ区南部的墓葬、灰坑和地层中。该阶段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葬式以同穴异性侧身屈肢合葬墓、单人双手交叠于胸的仰身葬、多种同穴上下叠葬墓为代表，该期墓葬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为四期之最。在Ⅱ区发现了2处火塘。

第三期距今3300~3000年，Ⅰ区南部遗存为主，以折沿磨光黑皮陶尖圜底罐为代表，延续了部分第二期的陶器器型，有小型化趋势。墓葬转变为拣骨葬为主的石室墓，随葬品稀少。墓葬周边出现立砌石围、平砌石墙，墓顶封堆等的大型石构遗迹，以及出现大型竖穴土坑墓和分室墓。

第四期距今3000~2000年，发掘区所见聚落布局发生明显转变，从墓地变为非墓地功能的大型石构建筑，同时出现祭祀灰坑遗迹；研磨器、网坠和简单石核—石片等类型的石器比例陡增。

科技考古研究结果显示：遗址主体年代跨度距今4800~2000年；距今4000多年前，人类生活在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大湖周边，气候条件和植被条件较现在优越；玛不错先民属于典型的东亚人种，是高原本土人群的代表，人骨材料反映了高原环境对人体生理的诸多限制，表现在生长发育迟滞、体型偏瘦偏矮、手脚骨关节炎等地方性疾病的高发，同时体现了较高程度的适应性，相对发达的上肢肌肉、高度的牙齿磨耗、极低的龋齿率以及那些与营养相关的常见骨骼病症的缺失表明，玛不错人群可能通过渔猎的方式获得了稳定的肉食资源并维持了较高的营养水平；玛不错第一期以渔猎为主要经济，食性显示以鱼为主要食物来源，同时发现一定数量的粟、黍和极少量粳稻遗存，体现本土化生态资源利用同远距离文化资源交流的多元性；第二期以后鱼类资源占比减少，以获取陆生动物资源为主，兼有畜牧业经济，尚看不出农业经济佐证；薪柴和木质葬具以香柏和江孜沙棘为主。

价值与意义

玛不错遗址丰富遗迹遗存的发掘与多学科研究，第一次突破了西藏新石器化进程的时空范围。该遗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在被多种外来要素不断影响下依旧保持自身文化特色鲜明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第一，第一期遗存是迄今所知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的墓葬，也是西藏中南部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俯身直肢葬，不仅属于西藏境内发现的第一实例，而且与青海宗日遗址同类葬俗关系密切。

第二，玛不错遗址第二、三期的文化面貌明显有别于已发现的其他遗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玛不错文化”。这一发现是继卡若、曲贡遗址之后，西藏新石器考古领域的又一座里程碑。

第三，玛不错遗址展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的连续发展和演变。遗址揭露出距今4400~3000年的连续文化层及墓葬，另发现了直逼距今5000年的早期活动区，以及距今3000~2000年的大型石构建筑群。这些发现不仅为构建史前青藏高原腹地长程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是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的参照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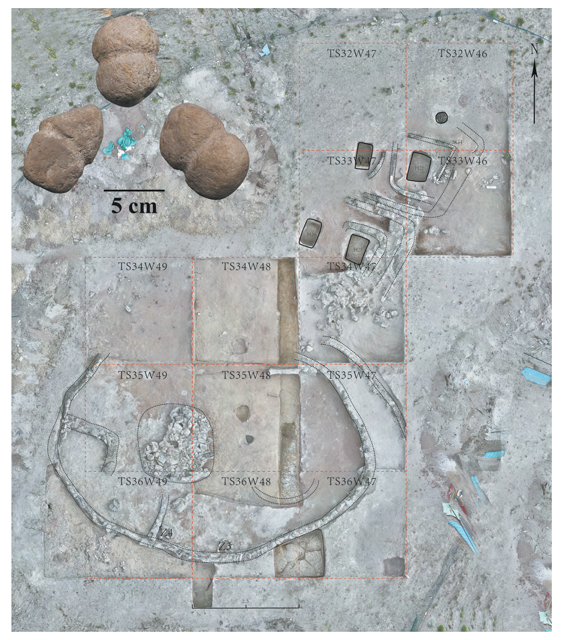
第四，玛不错遗址位于高原与南亚交界地带。空间上，位于文化交流的枢纽；时间上，发现了一批具有明确出土层位和高原测年最早的外来遗存，包括稻、粟、黍、海贝、象牙、羊、青铜器、滑石珠、费昂斯、红玉髓等。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高原地区跨大陆文化交流的诸多空白，而且对于研究互动背景下极端环境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第五，玛不错遗址多学科交叉工作模式，不仅实现了古DNA、陶器残留物、碳氮锶稳定同位素、体质人类学、动植物和古环境重建等技术手段的全方位研究，而且实现了从发掘现场到实验室的深度融合。玛不错遗址的案例为未来的精细化多学科交叉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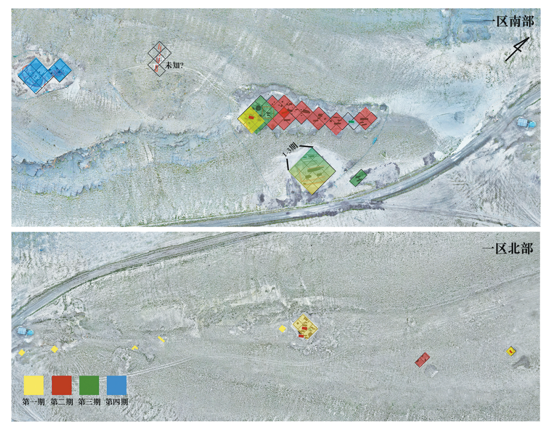
第六，玛不错遗址的发现，为西藏中部史前文化首次寻找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历史源头”，为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和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总体而言，玛不错遗址提供了理解早期高原人群如何围绕湖泊资源，通过各方文化融合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文化经济策略的适应与发展的史前人类的实践例子，生动地展现了青藏高原腹地高海拔区域史前人群在与南亚接壤的喜马拉雅中段的高原边地适应环境、文化传承与交流互动中艰辛但光辉的生存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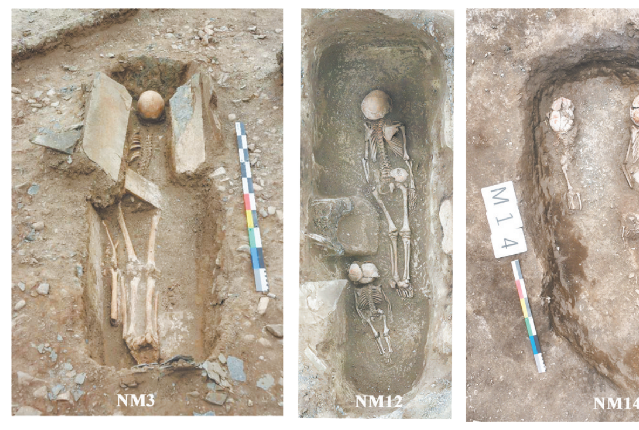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大学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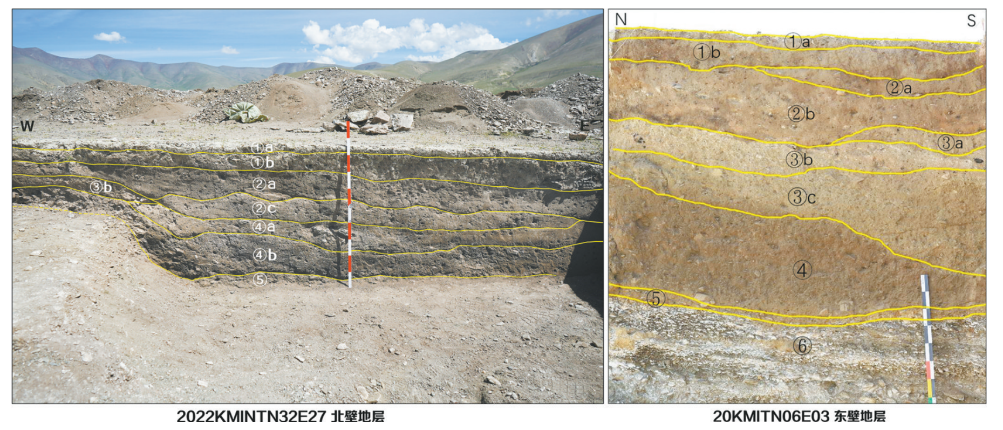
玛不错第四期石构4及其网坠



玛不错遗址遗迹分期示意图



玛不错第一期典型墓葬



玛不错Ⅰ区北部地层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为揭示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结构，进而探讨西周国家形态，周原考古队近年把探索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建筑群落作为田野考古的“金钥匙”与“总开关”。通过“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终于发掘到西周时期宫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墙，以及先周、西周与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群，实现了聚落考古的大突破。

完整揭露2座先周与1座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可确认周原遗址是先周都邑，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有力地推进了先周文化等重大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

以往学界虽多认为周原遗址应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但因缺乏明确的先周文化高等级遗迹，故质疑之声长期存在。近年在王家嘴区域钻探发现了一片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带，南北长超过150米，并完整揭露了2座大型建筑。

王家嘴一号建筑，由门塾、东西厢房、前堂、后室、前后庭院构成。庭院内多处保存踩踏面，台基仅余夯土基础部分，但柱网结构基本完整。建筑叠压京当型晚期灰坑，被先周晚期灰坑和墓葬打破，加上C14测年数据，可定一号建筑为先周文化遗迹。该建筑南北总长68米，东西宽34~37米，占地面积逾2500平方米，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为确证周原为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关键证据。

文献记载周原在战国时期的美阳，但以往美阳地望无法确认。近年在周原发现超过30万平方米的战国时期遗址。已发掘的王家嘴二号建筑年代为战国晚期，东西宽41米，南北长30米，面积1200平方米，初步判断为干栏式大型粮仓。在礼村南发掘了3座面积较大的战国晚期房址，这些规模较大的建筑应属官方建筑。已探明刘家墓地有上千座战国墓，该墓地多次出土“美亭”“美阳”陶文。这些信息皆指示王家嘴至刘家一带应是战国美阳。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若合符节，进一步确证了周原遗址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

发现了建造于不同时期三座西周城垣，初步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结构，大致厘清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这是周原遗址和西周都邑结构与形态的重大突破。

在以往长期探索的基础上，通过调查、钻探、发掘，确认了周原遗址存在宫城、小城与大城三座西周城垣。通过在城墙上16个地点的发掘，可判断小城和宫城均始建于商周之际，延续使用至西周灭亡。大城建于西周晚期，三重城墙在西周晚期时共存。

小城位于遗址西北部，东西约1480米，南北约1065米，方向352° ，面积约175万平方米。以往发现的西周城址中未有规模如此之大者。

宫城位于小城北部正中，与小城共用北墙，东西约800、南北约600米，面积5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宫城在三代宫城中屈指可数。钻探发现宫城内遍布夯土建筑，多条道路纵横交错。

宫城南墙保存较好，墙基宽约14米，由6版夯土组成，夯土保存厚度1.2米。墙外的壕沟宽23.6、深3.5米。揭露了宫城西北角，北墙宽7.5米，西墙宽10米，夯土基槽深1.2米，夯层厚8~10厘米。西墙之外有一条南北向道路，路面分三层，下两层分别铺大石块和密集的小鹅卵石块，其上车辙清晰可见。西墙边缘有一组南北向陶排水管，现存7节，总长6.8米。

大城位于小城东南，涵盖了周原遗址的核心部分。东西长约2700米，南北宽约1800米，形状规整，方向352° ，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大城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

大城西南角处，南城墙墙基宽10.4米，西城墙墙基宽9.5米。城墙基槽为船底形，内填夯土十分坚实。西墙外连接一座夯土角台，南北长46.8米、东西宽16.1米，与西墙同一次建造。这是中原地区三代城市中已知最早的城墙角台。

三重城垣的发现，丰富了西周城墙结构形制与建筑工艺的认识，使周原西周城市结构和发展过程豁然清晰。城址规模之大，充分彰显了周原遗址的都邑地位。三重城垣的形态，有别于夏商都邑，开启了东周都邑形态的先河。

完整揭露了大城东南门和宫城南东门，填补了以往西周城门发现的空白，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城门结构形制的认识。

大城东南门，位于大城东墙南三分之一处，由城台、外瓮城、南北门道、门塾、内瓮城、门内道路和建筑群等部分构成。

墙基向东凸出，加宽为城台，长94.6米，宽10.5~13米，东南、东北角都有向外加厚的墩台。城台基址处设南、北两处门道。北门道保存较好，南北宽5.3米，其北发现6个排列规则的磉墩，为门塾建筑。门道内有红烧土倒塌堆积，其下叠压原始路面，路面上尚存西周晚期大型铜器残片。内外瓮城中部各发现马坑一座，经发掘的外瓮城坑内埋马4匹。南、北两门道之上的两条道路，在入城后会为一条，先与南北向顺城道路相交，再继续向西延伸，已钻探长度210米，宽度达30~40米。

紧邻城内路南、北两侧，分别有建筑院落。两组建筑间相距24米。南组建筑共4座，呈四合院式分布。F1长11.2米，宽12.8米，四周有比较完整的卵石散水。F2长20.3、宽12.6米。两座建筑台基外包夯土台，形制规整，建造考究，应属官方建筑。北组建筑已发掘两座，可能也是四合院式院落。以往在全国发现的较为完整、保存较好的西周文化建筑院落为数甚少，这两组院落是研究西周建筑及其礼制的珍贵资料。

宫城东南门，位于宫城南墙偏东，门道呈亚腰形，两侧有6.5米宽的夯土夹墙，总进深约55米、宽6~10米。门道中段最窄处和门道北端各有一块包含大量石块的夯土，判断为两道城门的地基。门道中段东边，设有一条东西向的石砌排水道。南部门道路面倾斜，上铺石子，存多道车辙。正对门道的南城壕原本连通，但使用不久即用夯土填堵，形成通道。夯土东西宽42、厚3.6米，其上或还有城门建筑，因被汉代路沟破坏，已不可确知。

城门西侧壕沟的上层发现大量人和动物骨骼，或散乱分布，或集中放置。人的个体数在40~100之间，从婴幼儿到老年各年龄段均可见。动物骨骼有马、牛、羊、猪、狗等，以马数量最多。

大城东门规模宏大，宫城南门的多重结构开启了后世传统，这两座城门的发掘促进了周原城市形态和西周城市发展水平的认识，提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

发现一批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形制、年代、刻辞内容等方面多有新见，是西周甲骨文的一次重大收获。

宫城东南门西侧壕沟内出土卜甲、卜骨残片204片，初步辨识出刻辞180余字。这是继周原、周公庙遗址之后，发现西周甲骨文字数最多的一批。

出土甲骨中以龟背甲为主，占到发现总片数的60%以上，如此大宗的背甲集中出土，在西周甲骨发现中尚属首次。

甲骨刻辞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多方面，历史价值重大，如：

发现月相名“朏”，这是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可信性，对于研究早期月相与历日、复原西周年代等问题有极高的价值。

发现了多个国族名、人名，可以与金文和传世文献互相参照。如首次在甲骨文发现的“秦人”刻辞，是迄今对秦的最早记载。地名“蜀”“丰”，曾见于周原凤雏甲骨。刻辞“塱于霍”，是目前所见有关西周霍地的最早记载。

发现西周时期的王卜辞，如刻辞有“王呼并召…”“壬子王其兽(狩)…”“我呼侯…”等。王呼令诸侯的卜辞，是反映西周天子与诸侯关系的珍贵记载；周王狩猎的卜辞，涉及了当时多种田猎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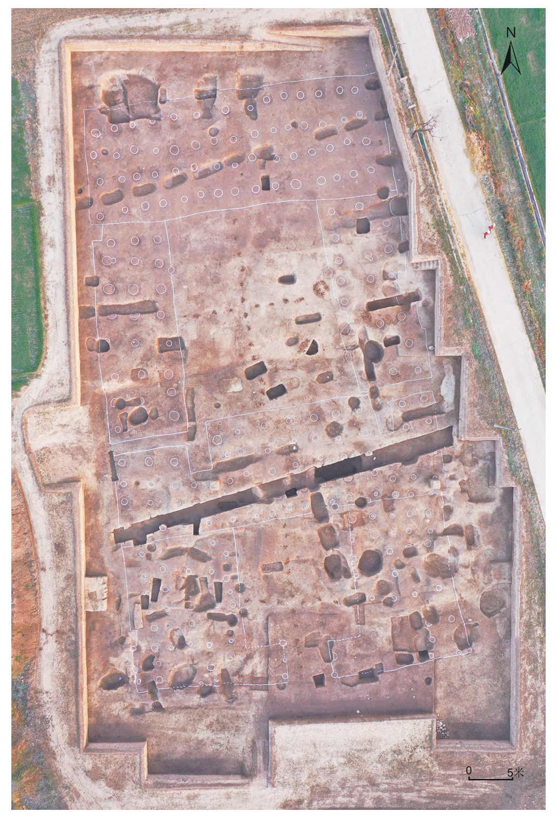
卜问“战戎”“于伐”“克虫(？)”的卜辞，揭示了多起西周王朝的对外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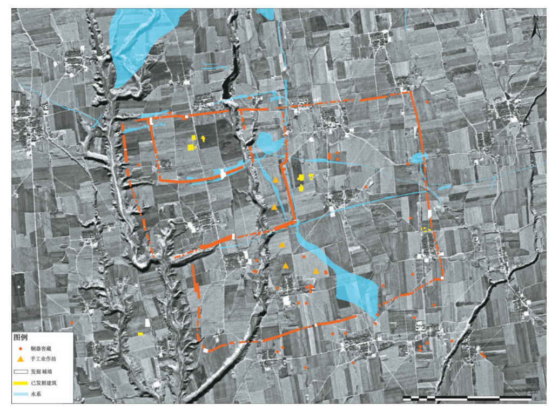
此外，本批甲骨中还发现一些新见字、待识字，已识字的新见写法等，具有很高的文字学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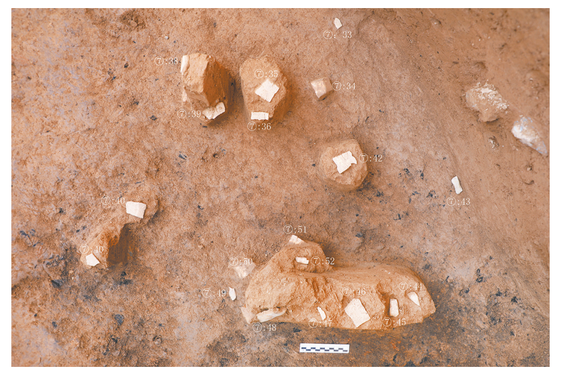
甲骨表面人工处理痕迹多样，如在一片龟腹甲的中缝两侧，有三组成对的钻孔，应系加固断裂的卜甲之用；在有些刻辞的字口内，发现有涂朱的痕迹；在背甲、甲桥等部位的边缘，多见锯切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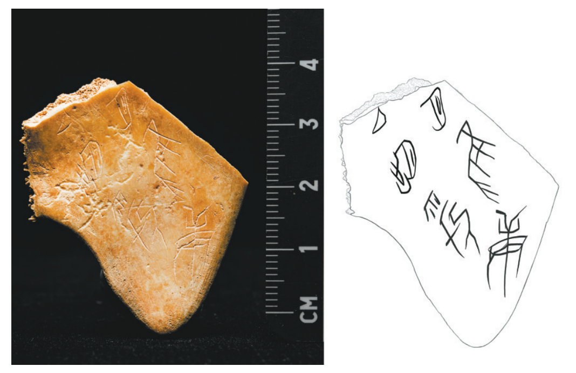
凡上可见，这批新出甲骨的内容丰富，价值重大，是研究西周甲骨学与西周历史的罕见出土文献。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家嘴一号建筑


周原三重城垣


甲骨出土状态(南—北)


有字卜甲

重庆合川钓鱼城加担土遗址

遗址简介

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西距合川城区约5公里，南距重庆城区约56公里，海拔高程186～391米。在13世纪宋元战争中，钓鱼城为南宋巴蜀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关键支柱之一，其地雄关高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居高临下、凭山控江，实为巴蜀要冲。城中军民“婴城固守，百战弥厉”四十载，竟“以鱼台一柱支半壁”河山，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的奇迹，敗亡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于城下，对宋、元双方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战争与时局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024年，钓鱼城加担土遗址考古发掘共清理揭露遗迹20余处，涉及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为城门2座(环城城门、内城城门各1座)、城墙4段、高台3处及道路3条，其中青华门为钓鱼城首次考古发现南宋环城城门，并以之为核心，结合环绕的城墙、高台等形成类似内外双重瓮城的城防结构，弥补了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重要缺环。2006年至今，通过大规模调查勘探，初步掌握了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结构、分布和分期等基本情况，并先后发掘了古地道、南一字城、九口锅、薄刀岭、武道衙门、马鞍山及东内城墙等一系列城防类遗址，发掘清理大批南宋城墙、城门、码头和高台等重要城防设施，钓鱼城遗址南宋山城城防体系不断取得重要收获和新的突破。

发掘成果

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是一处规模极为庞大、结构异常复杂、多次增修扩大的综合性防御工程。据文献记载，钓鱼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筑，征发了“(合州)五县之民，计户口八万，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可见其规模之大、营建之盛。目前，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主要考古发现有城门、城墙、码头和高台等防御设施遗迹，以及礌石、铁火雷、铁箭镞和铁蒺藜等防御武器遗物。此外，还在钓鱼城环城西北处发现元军队攻城地道1处，这是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处元军队攻城遗迹，也是古代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地道作战残迹。

城墙

夯土包石城墙，总长约9430米，包括环城墙、内城墙和一字城墙3类。

环城墙 主要沿钓鱼山顶部外缘悬崖分布，环绕山顶一周闭合，总长约5810米。现存状况较为复杂，以悬崖峭壁为天然城墙和宋、清、现代三个时期修建的城墙交替共存。

马鞍山遗址处宋代城墙叠压于清代山寨城墙下，发掘清理出宋代三次修筑的内墙、平台及道路等，结构复杂，多次加修。加担土遗址均为宋代、清代叠压的两期城墙。从外部石墙来看，仅最下几层砌石为宋代砌石，其上均为清代砌石。对城墙内部夯土进行解剖后，发现其内部夯土绝大部分为宋代夯土，规模非常大，而清代夯土规模极小，仅分布在靠近砌石的地方。由此可知，在钓鱼城降元毁城后，宋代石墙已大部分被拆毁或倒塌，但夯土仍保存较好，仍呈现为陡坡状，故在清代钓鱼城山寨修筑时，直接依靠较为陡峭的宋代夯土修筑，仅用少量夯土填充清代砌石与宋代夯土之间的缝隙。

内城墙 目前发现东、西两条内城墙，沿钓鱼山顶部一级台地边缘分布，总长约2180米。东内城墙绝大部分为砌筑墙体，零星以悬崖峭壁为天然城墙，总长约1080米。西内城墙大多以悬崖峭壁为天然城墙，推测总长约1100米，仅在近牛项颈城门处发现少量砌筑城墙，长24米，高8～10米。

一字城墙 自嘉陵江畔蜿蜒而上，直抵环城墙下，共有三条，总长约1440米。环城墙以南为东、西一字城墙，以北为北一字城墙。东一字城墙总长约400米，残高5米，墙基宽14.3米，城墙断面处有明显的三次修筑的石墙。西一字城墙总长约260米，残高3.5米，墙基宽5米。北一字城墙总长780米。

城门

6座，分为环城城门、内城城门和一字城城门3类，形制包括排叉柱式门、拱券式门及前拱券后排叉柱式门3种。

环城城门 1座，青华门。

青华门位于钓鱼城东北部，大部分叠压于清代钓鱼城山寨城门、城墙之下，目前仅见门道左侧后部砌石、夯土，门道内路面保存较好，形制应为排叉柱式城门。

内城城门 3座，牛颈项城门、午朝门城门和三龟石城门。

牛颈项城门位于西内城墙，直接在岩石中开凿而成，平面形状近长方形，南北残长13.2、东西宽9.6、残存最高处约4.15米，方向240° ，包括门道和门楼两部分。形制应为拱券式城门。

午朝门城门位于东内城墙中段，平面形状为长方形，由门道和左右墩台组成，门道进深11.5、宽2.25~3.1米，墩台长12.75、宽5.6、残高1.45~1.7米。形制为前拱券后排叉柱式城门。

三龟石城门位于东内城墙北段，两端条石垒砌，中部石板挂壁，保存状况较好，结构较为完整，门道前宽2.75、后宽2.6，进深7米，残高约1～1.5米。形制应为排叉柱式城门。

一字城城门 2座，南一字城东城门、西城门。

两座城门位于钓鱼城南部，西城门规模较大，平面形状近“八”字形，揭露长19、宽5.3～7.35、残高0.3~2.9米，由门槛、门道、八字挡墙、梯道和排水沟等部分组成。以规整的长条石为门道两侧地栿石，顶面各开10个方孔，作为立排叉柱的榫孔。形制相同，均为排叉柱式城门。

码头 3处，南水军码头、东水军码头和北水军码头。

南水军码头规模最大，位于南一字城西南角，南临嘉陵江，北接西一字城墙，平面形状呈近梯形，东西长86～112.5、南北宽55.3～70.25、残存墙体最高处达6.5米。东水军码头位于南一字城东南角，南临嘉陵江，北接东一字城墙，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状分布，平面形状呈近长条形，长41、宽28、揭露高0.8～2.1米。

高台 3处，加担土遗址GT1规模最大，南北残长约53.8米，东西宽约30～80米，残高1.4～5.1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位于青华门东侧，为人工修筑的夯土包石高台，内部夯土做法十分有特色，为红褐色黏土较杂非常多的杂乱石块，局部甚至直接以石块填充，夯土极少，包边石墙以规格较大的楔形条石错缝丁砌为层层内收的阶梯状。高台南部、西部为单独砌筑的包边石墙，北部、东部则直接依托高大的城墙作为包边石墙。

地道 1处，地道位于钓鱼城西北部城墙外缘，距地表深约5米，在砂页岩山体中人工开凿而成，由主道和六条支道组成，清理总长约27.6米，主道平面形状为略弧的长条形，剖面形状近倒“凸”字形，平顶、直壁微弧、凹形底，清理长约23、宽1.5、高1.3米，近正南北向。主道是沿山体边缘自北向南开凿，南端止于钓鱼城城墙下。

出土武器遗物

钓鱼城遗址出土宋代武器遗物数量较多，以石器和铁器为主，主要为礌石、铁火雷、铁箭镞和铁蒺藜等。

学术意义

经过二十余年来持续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我们对钓鱼城遗址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时空布局和演变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首先，在空间上，将已发现的、分散分布的城门、城墙、码头和高台等城防设施串联起来，开展综合对比分析研究，廓清了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基本格局，即在钓鱼城天然的山形水势基础上，修筑了一字城、环城和内城三重城墙以及多个城门的城防体系，体现了古人因山带江、重城叠筑、广开门路的城防思想和理念。

其次，在时间上，马鞍山、南一字城等均见有多次修筑的城墙，内城墙均为早期修筑，发现的城门形制存在较大差异，都为遗址分期研究提供依据。根据宋元战争形势的变化，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也不断演进发展。

第三，巴蜀地区南宋山城多达上百座，钓鱼城遗址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考古发现为巴蜀地区南宋山城防御体系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同时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提供强有力支撑。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马鞍山环城墙平面正射影像

加担土遗址GT1

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

金上京城，即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王朝修筑的第一座都城，是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2公里，阿什河左岸。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至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迁都至金中都燕京(今北京)，金朝以上京为都城，前后经历四代皇帝统治，历时达38年。作为一处重要的都城遗址，金上京城保存之完好程度，在历代都城中也是少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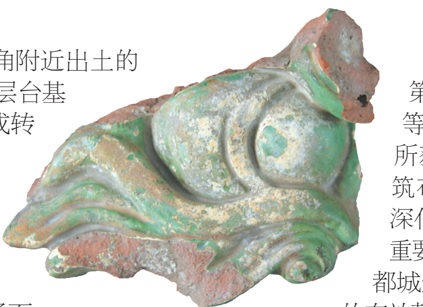
2024ASⅢT029020③：43
被烧焦在一起的条子瓦

金上京城由毗连的南、北二城组成，平面略呈曲尺形。两城总周长约11公里，总面积约6.28平方公里。城墙上筑有马面、角楼等防御设施，并有多个城门，有的城门外附加有瓮城。

金上京遗址地处我国东北腹地，是我国古代兼具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特征的一处重要的大型遗址。作为分布于我国最北端的一座古代都城，也是我国北方地区保存最好的都城遗址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2013年以来，先后对金上京外城城垣、外城门址、皇城及其皇城外大街道路系统开展考古发掘，并重点对皇城及南城(内城)开展较为系统的考古勘探，初步了解了皇城的建筑布局、特征和范围。

金上京皇城(即宫城)建于南城内偏西处，通过勘探，确认皇城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约649、东西宽约503米。在皇城西墙和南墙外，发现有壕。在皇城内中部，自南向北有五重建筑基址整齐地排列在皇城的南北中轴线上，东西两侧还有回廊基址，东部和西部主要为官署和宗庙区。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明确皇城内建筑单元布局、功能性质及年代沿革等情况，根据现地表地貌及保存状况及前期考古勘探情况，2024年发掘区位于金上京遗址皇城内中部宫殿区的东北部，从南往北的第五座建筑基址，即“第五殿址”。其不完全在中轴线上，紧邻中轴线偏东分布，规模较大，对其功能布局认识尚不清晰。为细化认识其特征结构，故选择对该建筑址局部进行较为完整的发掘揭示。发掘面积约220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本次发掘清理金代建筑基址4座、道路3条、院墙1道。其中完整揭露一座金代大型建筑基址，编号为1号台基址，台基平面呈十字形，由前后抱厦、左右朵殿、中心大殿组成。周边有道路、庭院、围墙等附属设施。1号夯土台基东西宽42米，南北长44米，周边有宽0.6～0.8米左右的青砖包边，包边外围为大范围的方砖铺地。台基从下至上有两层廊道，加上主体台基面，为三层台基结构。以建筑室内地坪至院落地坪高度计，台基总高为2.17米，其中一层台基面距外地面高1.08米。一层台基的北、东、西三部分贯通，走向与二、三层台基一致，至南则被二层台基分作东、西两角台。其北侧、西侧、西南角台、东南角台各设一踏道，与院内道路连通。二层台基面距外地面高1.55米，二层台基在东、西朵殿山面中进，南抱厦第一进东、西两面，以及北抱厦心间的对应位置各设踏道，与一层台基连通。由踏道垂带尽头相接的方形小础石和若干台基转角附近出土的开有榫口的角石可推知，原一、二层台基周圈皆设石栏杆，在栏杆尽头或转角处置望柱。


2024ASⅢT027019③：23
兽眼

1号台基中部的主殿平面方形，其东西、南北两方向柱网配置相同，室内减柱。主殿一层各面面阔5间，心间面阔5.27米、次间面阔3.41米、稍间面阔1.86米、通面阔15.81米。各面两稍间的外侧柱分别与南北抱厦、东西朵殿檐柱对位。南、北抱厦柱网形制相同，对称分布于主殿南、北两侧。两抱厦皆面阔3间，进深2间，室内减柱。其心间、次间尺寸与主殿相同，通面阔12.09米。进深方向尺寸，以南抱厦为例，自南至北第一进7.13米、第二进3.41米、通进深10.54米。东、西朵殿柱网形制相同，对称分布于主殿东、西两侧。两朵殿皆面阔2间，进深3间，室内对位设内柱。各间面阔4.96米，通面阔9.92米。进深方向为两山前进、后进皆3.41米、中进5.27米、通进深12.09米。由于内柱仅用础石，其下不施磉墩，且柱坑尺寸小于其他檐柱，推断其直径小于檐柱，衬于梁栿之下，起辅助承重的作用。台基上的柱网分布清晰明确，布局规整。磉墩边长约3.2米，柱础石边长约1.4米，夯土厚4米，磉墩厚3.4米，建筑规模之大较为少见。室内地面为方砖铺地，屋顶大规模使用釉陶瓦及釉陶构件。

1号台基的东侧叠压早期廊庑的一小部分，经解剖可知第五殿的夯土基础在修筑时占压了廊庑的一部分。台基的南侧有一砖砌隔墙(Q1)与第四宫殿址分隔开。发掘区的西北部揭露出一条青砖铺设的道路(L1)，清理部分东西长8.3米，南北宽2.56米，方砖错缝平铺，路两侧斜砌有长条龙纹砖包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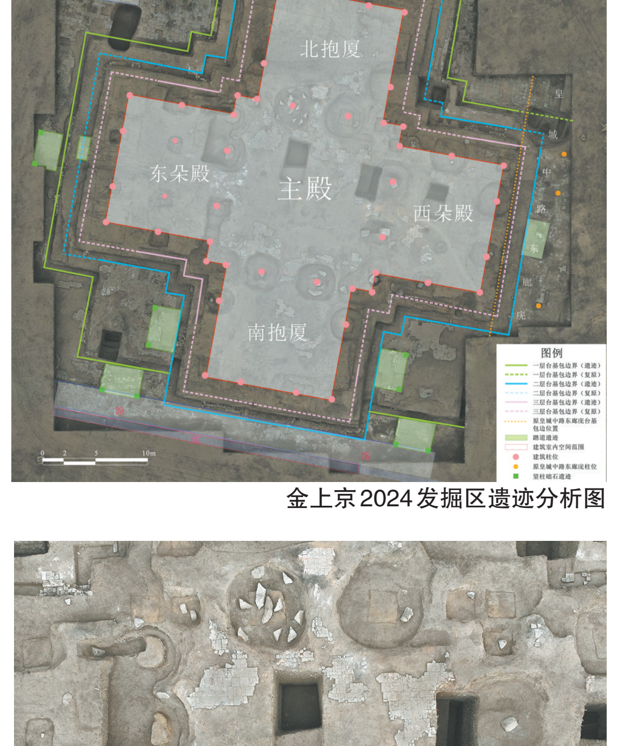
第五宫殿是皇城中路最后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整体居于中轴线偏东。从结构上看，此处为一座大型金代楼阁类建筑，等级较高。出土大量被烧焦的构件，推测该建筑毁于火烧。

出土器物以建筑构件为主，包括大量砖瓦和装饰性构件，以釉陶构件为主，种类丰富，级别较高。有少量的陶瓷器、金属器和大量铁钉。

第五宫殿遗址是金上京皇城中路核心区内首座经系统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初步复原表明，这是一座位于皇城中路内廷区的大型楼阁式建筑，具有多层高台基、用材等第高、重檐屋顶、满覆琉璃瓦等诸多高等级宫殿建筑的形制特征。其室内外铺地、柱网结构、屋面色彩的设计营造严整有序，层次分明，彰显了金代皇家建筑标准化设计的高超水平。主殿用减柱造，营造出大跨度的室内空间，反映了宋金时期楼阁建造技术的成熟与发展。体现了金代高等级皇家建筑独具特色的规划手法与建造逻辑，为考察金代皇家建筑形制特征、建筑技术发展，探讨皇家建筑见证的女真民族汉化进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史料。

本次发掘全面揭示的金上京皇城第五宫殿址，结构完整，建筑规模宏大，等级较高，是辽金都城考古的重要收获，所获资料对了解金代建筑技术、金代建筑布局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全面深化认识金上京皇城布局与沿革增添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将进一步推动金上京都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并为金上京遗址的有效整体保护提供学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 哈尔滨市阿城区文物所）



金上京2024年发掘区遗迹分布图

主殿(上为北)